

1921年7月30日,酷暑中的上海,气温高达37摄氏度。就在这闷热的晚上,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——李公馆里,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,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。不料会议开始不久,就有一个“穿灰布长衫”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,闯入了会场。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,张目四探,随即匆忙离去。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,马上转移,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。

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?经考证,此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。程子卿是怎么闯入一大会场的?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密探?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荣的把兄弟?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?



当年中共一大就是在这里召开的

夜闯中共一大会场者的人生命运

谁第一个确认了这个密探的身份?

多位一大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。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: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(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议),共产国际代表两人。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,关于会议场所,各位均认为在李公馆的楼上,取得了一致。关于时间也大致相同,只是在具体钟点上有小的分歧。而闯入者的服装,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,“穿着灰色竹布长衫”。陈生人的态度很好,“对不起”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,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。

这个“陌生人”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。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,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,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、2个法国侦探、2个中国侦探、1个法国兵、3个翻译,共9人。他们包围了李公馆,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,严密搜查,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。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,只好快快而去。

那么,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?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场的“包

打听”就是程子卿呢?

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。1990年,叶采访知情者——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□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。叶在《名人历史现场》中回忆道:

很偶然,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。中叔皇问我最近在写什么。

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,马上就说可找薛□莘先生聊聊,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。

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。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,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……薛先生是混血儿,父亲是中国人,母亲是英国人。他生在上海,九岁时到比利时,英语、法语都极为流利。母亲对他说:“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。”他后来回到上海,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。1929年,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。翌年,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。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。

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,他说,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。

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,程子卿曾跟他聊及,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——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“赤色分子”在那里召集会议。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。

此后,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□莘进行了口述采访,并公开发表。

1991年,叶永烈的《红色的起点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,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。

到情报说,“上海支那共产党”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。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“6月30日”,但开会地点却是“上海法租界贝勒路”(今黄陂南路),不见得是虚报。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,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。但是,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,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。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,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。

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,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场的相关信息,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。这就是上海报纸报道的《取缔集会条例》。条例规定,自8月1日以后,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,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,一旦探知,即加以处罚。

于是,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。

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?

而薛□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比较特别:

1921年6月底的一周,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(今淡水路)上例行巡逻时,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: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,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。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,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,最终了解到,这是北京政府许诺,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,就给他们一万大洋。他们还透露,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,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,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。根据这些情况,我将此事报告刑事组长查扎尔先生,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。

薛□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,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

卿对他说过很多遍,因此记忆非常清晰。他甚至认为,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:

闯入会场的插曲载入史册,说的就是一个穿灰色长衫的法国巡捕密探“打断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!事实上,很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。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,如果那个密探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,他们一个都逃不掉。而事后人们津津乐道那个穿长衫的密探,我是十分了解的:就是程子卿!程子卿终身穿旧式的长衫,夏天单穿棉布长衫,冬天在里面衬上双层棉夹袄。

但对薛的回忆,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。

由于程子卿的闯入,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,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。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,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。

上海滩的“黄老大”和“程老三”

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,生于1882年3月3日,初中毕业,在当时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。后因家贫在镇江的米店当学徒,天天拎米包,练就了过人的臂力。1900年前,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,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。根据叶永烈的叙述,薛□莘曾出示过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,可以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结实。他在那里结识了帮会首领兼“包打听”黄金荣和丁顺华,“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,结拜为青帮弟兄”,人称“黄老大”(黄金荣)、“丁老二”(丁顺华)、“程老三”(程子卿)。

薛□莘曾回忆:黄金荣、程子卿、丁顺华为拜拜兄弟。早年他们在郑家木桥一带做坏事。当时,洋浜浜里船只很多,浦东的商人划着船来此经商,黄金荣等便经常敲诈或抢劫。在法租界敲诈了就跑过洋浜浜,逃到英租界去。反之,又跑回法租界。后来,法国人为了“以毒攻毒”将黄金荣引入巡捕房。后来,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了。

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。有资料表明,1908年经黄金荣介绍,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——那年他才26岁。程子卿尽管不懂法语,但为人机警,办事能力强,官运比把兄黄金荣要好。辛亥革命前后,黄金荣经人介绍曾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,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,因此程子卿也跟随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。他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

解放后他命运如何?

笔者手头有一张程子卿警察证的影印件,从中可以解读出一些历史的信息。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,供职于法国领事警察局,即法租界巡捕房,警号为631号,等级为侦探督察长,编号为501号。发证时间为1943年。就在那一年,汪精卫伪国民政府“收回”了法租界。由此可见,程子卿并没有在1939年退休,程子卿自称“在法捕房35年”。法租界被收回后,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。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三等警监。8月17日起,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。是年12月1日,又转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,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。抗战胜利后,据说程子卿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,拿份干薪,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。薛□莘则认为,程子卿并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正式军官,没拿过什么薪水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程子卿留在了上海。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,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,他便向宋庆龄求助。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,程子卿没有被捕。知情者薛□莘指出,“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,解放后被审查时,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,在年老患病期间,才未予关押”,“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通道的间谍”。此后他赋闲在家的职业为“年老无业”。但生活颇不错,上世纪50年代他家里仍雇有3名佣人,还有一位奶妈。程子卿虽没有职业,但儿女均学有所长,成为医生、技术人员,孙辈环绕膝下,安享天伦之乐。1961年9月27日,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,终年79岁。他夫人杨景德于1980年因肺炎病故,终年83岁。

解放初,人们并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共产党成立会场的“不速之客”,否则也许会留下更多的一手资料。不过对于程子卿来说,这或许是值得庆幸的。

(作者系文史学者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)

苏智良/文 摘自《同舟共进》



中间的这个人就是程子卿



栩栩如生的蜡像群将历史定格于这个伟大时刻

中共秘密开会的消息如何泄露的?

那么,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的呢?

已有的史料披露,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,获释之后就成为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。他在动身来华后,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,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、巴东、新加坡、香港时,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。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(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),并以《地方经济学家》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。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,报告马林的行踪,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,并化名安得烈森人住南京路东方饭店。

所以,马林到上海后,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,并记录在案。实际上,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。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